日本明治时期“虞初体”汉文小说集述略*

孙虎堂

内容提要 我国清代文人张潮编选的小说集《虞初新志》在18世纪初问世以后，不久便传入日本，并很快受到了文人阶层的喜爱。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它逐渐成为日本文人研习汉学的经典书籍。明治时期，文坛上诞生了几部“虞初体”汉文小说集，这些仿作成为江户时代以来《虞初新志》在日本影响的集中体现。本文以近藤元弘的《日本虞初新志》和菊池纯的《本朝虞初新志》为中心，探讨了它们在编创体例、旨趣、方法以及作品文体等方面的特征，并指出了此项研究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明治时期 虞初体 汉文小说集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从明代到近代，以旧题《陆氏虞初志》为开端，先后出现过数部以所谓小说始祖“虞初”之名命名的文言小说选集，学界通常称之为“虞初体”小说集。以清代张潮《虞初新志》的刊行为标志，这类小说集在编选体例上经历了一次大的变革。明代的“虞初体”小说集选录的是笔记体志怪小说和传奇体志人、志怪小说，而且这些小说主要是明代以前特别是南朝和唐代作家的作品。至清代，从《虞初新志》开始，选录对象由前代作品转为当代作品，体裁上则侧重实录色彩浓厚的杂传体小说，另外作者还将一部分说、书、序、疏、墓志铭等应用文体作品和随笔、游记、寓言等散文作品收入集中，题材变得更加广泛。《虞初新志》刊行以后，仿作迭出，它不但在我国成为畅销之作，江户中期输入邻国日本后，也受到了日本文人们的喜爱。明治时期问世的《日本虞初新志》、《奇文观止本朝虞初新志》(以下简称《本朝虞初新志》）等几部汉文仿作便是日本文坛受其影响的产物。

一、《虞初新志》在日本的影响

据日本当代学者大庭修对《商船载来书目》的研究，《虞初新志》在桃园天皇宝历十二年（1762）即已被舶载入日，此距该书的刊行已超过半个世纪，而实际的输入年代可能更早。[①]《虞初新志》输入日本之后，似乎很快就受到了文人们的喜爱，但可能因为数量有限，它在文人中间的大规模影响并不十分显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09YJC752018）及山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基金项目（2010GGTD01）的阶段性成果。

著。其深刻影响文人欣赏、创作和编选活动而成为仿效的对象，乃在和刻训点本出现之后。最早为《虞初新志》做训点的是荒井公廉，其训点本二十卷十册，由京都植邑藤右卫门于仁孝天皇文政六年（1823）梓行。荒井氏在《翻刻〈虞初新志〉序》中说："《虞初新志》舶来已久，其事悉奇，其文皆隽，览者莫不拍案一惊，为小说家珍珠舶以购之。是以其书日乏，而价亦跃，人颇窘焉。浪华书肆某等胥谋翻刻之，且欲国字旁译，以便读者也。"[②]这段话说明了该书受日本文人喜爱的情形，以及训点、翻刻的原因和目的。此和刻训点本后来成为《虞初新志》在日本最流行的本子，从文政至明治四、五十年间被再版数次，据研究，目前至少有五种印本。[③]这种现象一方面折射出文人们对《虞初新志》的喜爱程度，一方面也反映了它在文化出版界的流行程度。这里再举两例：德川幕府官办的昌平阪学问所学头（首席教授）佐藤一斋（1772－1859）曾编著汉籍入门书《初学课业次第》，书中除了列有"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汉籍经典外，又列《世说新语》、《何氏语林》、《皇明世说》、《今世说》与《虞初新志》五部小说；同样，教授古鹤煜（1788－1847）也曾编著汉籍入门书《读书矩》，他将《虞初新志》列为"入门"、"上堂"、"入室"三阶段中最后一阶段的必读书。[④]窥斑见豹，《虞初新志》对江户末期日本文人阶层阅读和学习汉籍的重要性，由此可想而知。

到了明治时期，由日本文人编选的《虞初新志》的汉文仿作出现了，这成为江户末期以来该书在日本影响的集中体现。这里所谓"仿作"，是指在编选旨趣、体例等方面与《虞初新志》相类似的汉文文言小说选集，而并不过分拘泥于诸如书名中包含"虞初"甚或"虞初新志"这样的语词，或者编选者明确宣称效仿《虞初新志》这样的标准。具体来说，判定一部文言小说选集是否为"虞初体"，笔者认为主要应依据两个原则：在编选旨趣上，正如张潮所言，应辑录"一切荒诞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以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虞初新志·自叙》），目的是"表彰佚事，传布奇文"（《日本虞初新志·凡例五则》）；在编选体例上，以编选日本当代文人的作品居多，或编选编者本人独立创作的有关日本当代人物或事件的作品为主，且体裁方面以杂传体小说为主，间杂叙述性散文等其他作品。考察目前已经发现的日本汉文小说作品，近藤元弘的《日本虞初新志》和菊池纯的《本朝虞初新志》当属典型仿作。前者编选他人作品，后者编选本人作品；前者在编选旨趣、编辑体例诸方面对《虞初新志》表现出亦步亦趋的倾向，后者则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创新色彩。

二、编选他人作品：近藤元弘的《日本虞初新志》

近藤元弘（1847－1896），字仲毅，号南崧樵史，伊豫（今爱媛县）人，幕府末期至明治前期有名的儒者、汉学家。他是当时名儒近藤平格（1800－1868）的次子，与兄元修（1839－1901）、弟元粹（1850－1922）以汉学及汉学教育而著名，当时人称"近藤三兄弟"。元弘继承家学，学德俱高，颇受时人的尊敬。他又努力研究汉学，成绩卓著，著述有《南崧诗稿》、《诗文稿本》等。明治十三年（1880），他在松山市萱町开设了一所私立学校，名曰"时习书院"，培养了一批汉学人才，对日本明治时期的汉学教育做出了贡献。[⑤]

《日本虞初新志》现有明治十四年（1881）刊七卷本。据卷首《目次》来看，正册加附录共收作品 135 篇，皆出自当时名士之手，但实际仅存首两卷两册 36 篇作品。据作者在《凡例五则》中的说明，可知他编辑该书的时间在明治四年（1871）左右，而且原

稿中每篇篇末还有其本人针对作品所载人物或事件所发的议论，但这些议论在出版时被删掉了。实际上，在篇末发表议论正是作者模仿《虞初新志》编辑体例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藤元弘在编选实践中是全然以《虞初新志》及其续书为样板的。他在《凡例五则》中说：

> 尝读清张山来《虞初新志》及郑醒愚《虞初续志》，反复不措，颇有所会意也。然事皆系于西土，至本朝，未见有如此者，岂不一大憾事乎！……山来曰：“虞初为汉武帝时小吏，衣黄乘辎，采访天下异闻。以是名书，亦犹志怪之帙即‘齐谐’以为名；集异之书，本‘夷坚’而著号。”故樵史亦以名斯书，盖拟山来编纂之意也。[6]

具体来说，这种模仿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表述皆见于《凡例五则》。其一，嗜奇的编辑心态。其云：“樵史性多奇癖，故每逢异书奇传，辄为购求借览焉。”其二，娱乐的编辑主题。其云：“非敢谓有裨补于世教，然而展翻之间，有或悠然而畅怡心目，或忼慨而挥擢志气，则实为意外之幸。”其三，“错综无次”的编辑体例与“表彰轶事，传布奇文”的编辑意向。其云：“樵史选斯书，有名家文而不取者焉，盖以所纪之事不奇也；有不名家（文）而收之者焉，盖以所叙之迹可传也。故玉石混淆，错综无次，虽不免狗续貂之诮，要祇期表彰轶事，传布奇文耳。”其四，编选作品的时代范围、题材特点与实录性质。其云：“于是就本朝名家集中，遇山来所谓‘凡可喜、可愕、可讥、可泣之事’，则随读随抄，汲汲不倦。积年之久，渐得数十篇矣。……独忧其采辑无多，更自近人所著史传、杂志等，搜罗凡事涉奇节伟行者，合为七卷，名曰《日本虞初新志》。”“而如狐狸之妖，厉鬼之怪，则本邦文士概视以为荒诞不经之事，曾不上之笔端，故其所选，多属实录。”其实，关于这四个方面的表述内容，都脱胎于张潮《虞初新志》的《自叙》和《凡例十则》。不仅如此，近藤元弘甚至还效仿张潮的语气，表达了更辑续编的意思：“本朝以文章名于世者，不为鲜焉，故其集行于世者亦多矣。第愧僻境乏书，涉猎不甚广，故其所遗漏者，则他日更辑续编，将继而公诸世也。”（《凡例五则》）总而言之，也正是由于作者基于如此明确的编辑思想，才使得《日本虞初新志》在编辑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与张作如出一辙，像载录被选者姓名，同时选录“一事而两见者”，像多次选录同一人的不同作品，等等。再比如，该书的文体驳杂，主要是杂传体小说，除此之外，还有近于传奇体小说的作品，再就是有史部纪事体、序文、墓志铭、寓言、碑文、行状等各体散文作品。这个特点也和《虞初新志》几近相同。由此可见，《日本虞初新志》可谓《虞初新志》的“异国姊妹篇”。

三、编选本人作品：菊池纯的《本朝虞初新志》

菊池纯（1819－1891），字子显，号三溪，纪州（今属大阪府）人，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的著名儒者、汉学家。他早年从名儒林桎宇习汉学，后来做过幕府儒官，挂冠归隐之后，辗转京都、东京、大阪等地聚徒讲学，直至逝世。菊池纯一生好学不倦，勤于著述，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化名人。他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文学创作上：诗文方面有《晴雪楼诗抄》、《三溪文钞》等，小说方面有杂传体小说集《本朝虞初新志》、笔记体小说集《西京传新记》、翻译小说集《译准绮语》等。除此之外，其未刊手稿又有《晴雪楼杂稿》、《铁屏书屋杂稿》、《三溪遗稿》和《学聚堂丛书》等等。[7]这些创作实绩可以说明，他为日

本汉文学最后的辉煌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朝虞初新志》一书，现有明治十六年（1883）刻本，三卷三册，载作品 25 篇。作者在《凡例六则》中说，他在 40 年前曾创作并编辑过一部十卷本的《消夏杂志》，而这部新书即是以《消夏杂志》为主体，又补近作诸篇而成。书名之所以做了改动，据作者说是“盖从书估所好也”，但实际上书估的请求可能深合其本意。名儒依田百川在《〈本朝虞初新志〉序》里的话可为佐证，其云：“（先生）顷读张山来《虞初新志》，意有所感，乃遍涉群书，博纂异闻，体仿前人，文出自己，釐为若干卷。”这段话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作者在该书的著述体例和作品文体方面确有模仿《虞初新志》的意识。但另一方面，他在编选方式上又做了很大的变通，即由编选他人作品变为编选本人作品，也即所谓“体仿前人，文出自己”，体现了作为“虞初体”汉文仿作之创新的一面。

同时，编选方式的转变也使全书在题材选录标准、编创旨趣、作品文体特征和创作方法等方面呈现出了相对协调一致的面貌。《凡例六则》第六则云：“此编所揭，遗珠亦不为不多矣，而稿已备焉，陆续上梓，欲问于世。至其奇事异闻，怡人目，快人心，则宁此仅仅兔册而止乎哉！”这则话，一方面似乎表明了作者有续编其书的意思，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作品的题材选录标准与作者的编创旨趣。首先，以“奇”、“异”作为题材选录标准，反映了古代中日文人通有的“嗜奇”创作心态。菊池纯在这方面和张潮相当一致，正如张氏所言，他们感兴趣的题材是“一切荒诞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其次，菊池纯“怡人心目”的编创旨趣也和张潮相似。张氏曾说，他的书能使人在酬应之余，“涤烦祛倦”、“开拓心胸”、“具达观而发旷怀”（《虞初新志·自叙》），“读书之暇，展卷尽可怡神；倦息之余，披翻自能豁目”（《虞初新志·凡例十则》），菊池纯所谓的“怡人目”、“快人心”，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不过，他在此之外又表现出了劝惩的旨趣，体现出他作为儒者的特色。《稗史小传》是书中的一篇小说，作者在正文前用“三溪氏曰”的形式发表了他对小说功能的看法。他认为，名匠鸿儒以为稗官野史无用而加以摈斥，实则有些时候它们在“令愚夫愚妇油然感悟，起忠孝节义之志气”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正史。这样看来，稗官野史确能“裨补名教”。秉持这种观念，菊池纯在多篇作品的文末评语里表达了深具劝惩色彩的各种意见。在此方面，他比张潮要走得远，尽管后者在《虞初新志》里也选录了像《义虎记》、《孝犬传》和《鬼孝子传》等意在劝惩的作品。

《本朝虞初新志》中各篇作品的文体并不统一，写人诸篇为杂传体小说，其中篇幅较长的几篇文辞细腻，叙事婉曲，人物形象鲜活灵动，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传奇体小说，尤其是改编自新闻报导的《胭脂虎传》和取自近闻的《丸山火灾》。另如纪事的《离魂病》和《一眼寺》两篇，可以视为志怪题材的笔记体小说。其他各篇，有游记散文，有书信，有笔记体杂录，有羼杂虚构成分的纪事散文。由此可见，这种以杂传体小说为主并杂以其他散文作品的著述体例，和张潮的《虞初新志》并无二致。

与作品文体特征相对应的，是“实录”和“虚构”两种创作方法。《凡例六则》第四则云：

> 此编仿蒲留仙《聊斋志异》之体，然彼多说鬼狐，此则据实结撰。要寓劝惩于笔墨，以为读者炯诫而已。然至掀髯走笔，会心得意，不可抑遏，不能悉据实。实中说虚，虚中存实，读者试猜孰是实，孰是假，孰是根据，孰是演义，又是一乐事。

《稗史小传》篇首“三溪氏曰”：

（稗官野史）无中生有，实中说虚，结蜃楼于空中，驱风雷于笔端。凡忠仆义奴之传，美姬艳妾之说，与夫老贼巨偷、神怪鬼妖之事，标新钓奇，使读者拍案绝叫，有地裂天惊、山鸣水涌之思也。

所谓“实中说虚，虚中存实”、“无中生有，实中说虚”云云，即指实录和虚构的创作方法。一方面，实录是史书写作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菊池纯曾写过《国史略》和《近世纪略》这样的史书类著作，还从事过《日本野史》的校订工作，因此他在撰述稗官小说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实录”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史书写作中虚构叙事的存在，同样也是一直以来的事实。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之《史传》篇里说，因为“俗皆爱奇”，所以史家在撰述时常常会一定程度上违背“贵信史”也即实录的原则，为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而“弃同即异”、“穿凿旁说”。[8]的确如此，史书中最具此种叙事特征的门类就是杂史、杂传，换句话说，它们一定程度上具有小说的文体特征。即如前文所述，《本朝虞初新志》中的叙事作品多半有着杂史、杂传的性质，再加上文字运用上的夸饰手法和题材上的“奇”、“异”特色，使它们最终成为留有史传痕迹的小说作品。由此可见，菊池纯似乎对史传虚构叙事与真正的小说虚构叙事在原理上的同一性有所觉悟，也即是说，他所使用的实录和虚构的创作方法既继承了史书的写作精神，同时也显示出了他本人对小说虚构叙事的真正体悟。

四、其他“虞初体”汉文小说集

除了前述两书之外，明治时期较具代表性的“虞初体”汉文小说集还有大槻盘溪的《奇文欣赏》，依田百川的《谭海》与《谈丛》。

大槻盘溪（1801－1878），仙台人，名清崇，字士广，号盘溪，为幕府末期至明治前期的名儒，曾任仙台藩藩儒，养贤堂学头，其著述除《奇文欣赏》外，又有《〈论语〉约解》等近70部。[9]他编选的《奇文欣赏》一书刊于明治元年（1868），四卷四册，选录的都是他人作品。编者在书中本着“任诞矜奇”的编选旨趣，遍采当时各家传记文名篇于一编，将作者姓氏名号和选作一同载录，且又在每篇文末以“盘溪子”的口气对文中人物、事件或主题做出简短评论，在编辑旨趣、体例等方面无一不与《虞初新志》相类。

依田百川（1833－1909），下总人，名朝宗，字百川，号学海，是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的名儒、汉学家，曾任佐仓藩的藩学儒官、权大参事、明治政府的修史局修撰、编修、文部省权少书记官等职，后归隐，以漫游、著述自娱。其著述除《谭海》、《谈丛》外，又有“和汉混合体”小说《侠美人》、歌舞伎剧《吉野拾遗名歌誉》、游记《百川纪踪》和戏曲评论集《新评戏曲》等。[10]其所著《谭海》一书，先有明治十七年（1884）凤文馆本，两卷两册，载作品72篇。这个本子在当时颇受欢迎，“远近传观，洛阳纸贵”（凤文馆本之川田甕江《〈谭海〉叙》）。明治二十五年（1892），博文馆购买了此本镂版并将其改版，先出两卷，继之又编辑出版了载有44篇作品的另两卷，此即全四卷的博文馆本。《谭海》选录的都是依田百川自己的作品，其中既有杂传体小说、笔记体小说，又有纪事散文和笔记杂录，相对于《虞初新志》而言，其编选体例显然有创新的色彩。作者使用晓畅的古文，“记述近古文豪武杰、佳人吉士之传，与夫俳优名妓、侠客武夫之事行”（菊池纯《〈谈海〉序》），创作旨趣乃在广见闻，寓劝戒，裨补名教，此又与《虞初新志》相类。书中有一些篇目是通过叙写氓黎百姓、市井贱民的故事来表彰忠、孝、节、义等传统封建道德，有些

篇目则是通过描写主人公独特的精神风貌来张扬个性的传统思想趣味，还有一些篇目是通过对主人公奇行逸事的记录来表现明治开化时期新的时代精神。概而言之，依田百川在《谭海》中通过各类作品既强调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又反映了新旧交替时代的精神趣味、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

依田百川另有《谈丛》一书，现有明治三十三年（1900）活字排印本两卷两册，载作品81篇，均为其独撰。该书在体例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杂传体小说与纪行散文交错并行，这显然是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心理，“盖英雄豪杰，名士美人，与山水花月相映发，可以快读者心目”（门人冈崎壮《凡例五则》）。此外，各篇作品除了文末附有作者本人冠以“百川曰”的评语外，又附菊池纯等13位文坛名人的眉批和文末评语。这些评语或阐发作品主旨，或评论行文妙处，与作品本身相映生辉。不难看出，就编选体例和作品文体而言，《谈丛》与《虞初新志》相类。就创作主旨而言，与《谭海》一样，百川在《谈丛》中也是深有寄托的。信夫粲在《跋》文中说，该书叙“忠臣孝子、烈士贞妇、义仆侠婢事”，“此编出一家言，而寓意其间，以规讽当世，警醒后人，自有不朽者存焉”，认为书中有劝惩之寓意，这说法是颇合作者本意的。另外，大槻修又在《引》文里提到了该书的刊刻缘起：国字改良论兴起以后，百川对“世人视汉文如土芥”的文化现象非常忧虑，认为“逐时趋势之徒，直把汉文为漫为缛，甚则欲废弃之”，却“不知国文虽由字与语，其结构布置，不得不取准汉文”，也不知“不熟汉文，则国文终不能妙”的道理，以致“世之学者，往往陷溺所习，不省其他，如文辞，亦概置之度外，是以笔失精神，文竟归死物”。因此，他希望大槻修能帮忙刊行此书，以助其实现反驳时弊的愿望。这件事情表明，对于身处西学大盛、汉学衰微之时代潮流中的作者而言，《谈丛》之作是颇有现实用意的。

结 语

国与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和影响，往往存在种种不可预期的偶然性，作品的接受与经典的形成也常常是各种机缘的巧合，因此创作上的模仿活动自然会随着特定文化语境与具体创作场景的变化而变化。《虞初新志》的输入和影响，以及明治时期汉文仿作的涌现，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个规律。这些仿作的编创者皆属于新旧交替时期的儒者阶层。由于身处同一文化语境，他们的编创旨趣较为一致，一是有助娱乐，二是劝善惩恶、“裨补名教”，模仿中的时代影响甚为显著。同时，这些仿作又具有鲜明的双重属性。它们在编选体例和作品文体方面既有和《虞初新志》相仿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在题材类型方面既与《虞初新志》有着广泛的相通性，具体作品内容却又颇多个人色彩和本土意味。总而言之，这些汉文小说集是近世以来中日文学交流的独特产物，尝试从国家或地区之间历史文化交流的角度去研究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丰富图景，还能够对两国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 大庭修：《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版，696页。

② 荒井公廉：《翻刻〈虞初新志〉序》，载大阪府立图书馆馆藏训点本《虞初新志》卷首。

③ 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汲古书院1976年版，147页。

④ 长泽规矩也：《江户时代支那学入门解题集成》第二集，汲古书院1975年版，106—117页。

⑤ 《松山市史》编集委员会：《松山市史》第三卷，松山市役所1993年版，800页。

⑥ 王三庆：《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一册，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版，153页。（本文所引《日本虞初新志》、《本朝虞初新志》正文内容及相关凡例、序跋等内

容均出自王三庆主编之《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一册，恕不一一注明。）

⑦ 佐藤义亮：《日本文学大辞典》，新潮社 1935 年版，1296—1297 页；李进益：《明清小说对日本汉文小说影响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 1993 年博士学位论文，236—247，272—284 页。

⑧ 刘勰：《文心雕龙》，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79 页。

⑨ 小川贯道：《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名著刊行会 1970 年版，130—131 页。

⑩ 佐藤义亮：《日本文学大辞典》，新潮社 1935 年版，1327－1329 页；小川贯道：《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名著刊行会 1970 年版，558 页。

Collections of Yuchu-Style Short Stories by Chinese Writers in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

SUN Hutang

Abstract: Shortly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China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Yuchu Xin Zhi*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and immediately gained popularity among the Japanese literati. During the next century, it became a classic in Sinology. In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 collections of short stories appear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Yuchu Xin Zhi* from the period of Edo. This essay studies *The New Records of Yuchu Xin Zhi* by Sankei Kikuchi and *The New Records of Yuchu Xin Zhi in the Present Dynasty* by Motohiro Kondo, focusing on the form of organization, leitmotiv of writing, creative methods, literary styles,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 Yuchu styl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by Chinese writers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林丰民